

与谢毓元同志早年共事情谊

嵇汝运

当我于1953年来药物所报到工作时，谢毓元同志已是药物所的科研骨干。当时武康路药物所的人员还很少，吃饭时只需一张乒乓台就够全体人员围坐了，厨师也只有一个，所以谢毓元同志是药物所元老之一。

谢毓元是清华大学化学系高材生，是知名化学家张青莲教授的得意门生，毕业后留校任助教。当时武康路药物所内部空虚，亟需得力人才，而赵承嘏所长与张青莲教授交往甚厚，张青莲教授就将谢毓元支援我所。他来所后不但辅助赵所长进行中药成份研究，并且协助赵所长的文书管理工作。那时所里还没有行政管理人员，更没有科室，直到上级指派杨秘书来所主持行政人事等工作后，他才能专注科研工作。

我所在1953年底制定来年科研工作时，明确开始合成新药的探索，但在武康路也只有两个课题组：高怡生副所长领导氯霉素类似药物的研究，我主持血吸虫病新药的研究。谢毓元与我在一起，此外科研人员还有朱应麒、黄知恒、杨行忠、周启霆，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。隔了不几年，又增加了章辛、陆顺兴、陈志豪。我们的合成从带有两个巯基及另有极性基因的化合物开始，再制成锑衍生物，其中谢毓元合成二巯基丁二酸的锑化合物。开始大家合成都不很顺利，刚好那时JCS有这类化合物的报道，参考了试着合成也颇费心思，特别中间体很不稳定，制备有难度。谢毓元终于成功地合成了，并接上锑，经药理组试验这锑化合物比临床应用的酒石酸锑钾毒性更低。当时临床治疗大量病员时遇到一个问题：个别病人用药时因锑中毒而死亡，因而要求我所寻找解毒剂。我们设想二巯基丁二酸的锑化合物毒性较低，将二巯基丁二酸钠溶液注射，使其在体内与锑结合，应有解毒的可能，于是我所开展二巯基丁二酸钠解锑毒的研究，实验证实了这药物的价值，但我们请血防局安排药厂生产却遇到生产技术困难。

在五十年代，出国进修、留学主要派往苏联，科学院分配我所两个名额去苏联读研究生。当时鉴于谢毓元是全所最优秀的青年科研人员，我所便报院派送他去苏联深造。在出国以前，他光荣地在我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有幸参加了他入党的会议，深为激动高兴。

谢毓元出国不久，迎来了大跃进年代，我们不但在所内院子里建造炉子大炼钢铁，也响应时代号召，走出深院大所，结合生产，搞科研革命。因为二巯基丁二酸钠原在实验室小量制备，不易大量生产，药厂始终未上马，我们全组便开往新闸路新亚制药厂（其后更名为上海第八制药厂），与工厂职工合作，在车间就地边干边改革工艺，苦战数月，终于完成新路线，一下生产了十几公斤，大量治疗血吸虫病遇到中毒病员时应可保证药源。

谢毓元在苏联学习几年后学成胜利回国。那时正值我所以天然药物为中心，为了完善科研，成立天然药物合成研究组，由谢毓元领导，实验室放在枫林路抗菌素大楼内，其后任谢毓元为抗菌素室副主任。谢毓元在天然化合物合成领域内，完成了一些高难度莲心碱等天然化合物的全合成，提高了我所的化学水平，从而也提高了我所的声望。

文革以后，因工作需要，谢毓元又调任国防科研的五室领导。七十年代后期，我所整顿全所室组机构，谢毓元又调回合成室任领导。这样，谢毓元是所内唯一“周游列国”的科研人员，熟悉各方工作，接触众多人员，为他八十年代出任上海药物所第三任所长提供了有利条件，达到心中有数，治所有方，为我所以后年代中不断前进，全面发展开创了局面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已临庆谢毓元院士八旬大寿。回顾早年我们共事的情谊，却不胜神往，聊为小记。